

漢書新注

施丁 主编

漢書新注

三秦出版社

责任编辑:淡懿成

周鹏飞

封面设计:毋培华

封面题签:赵步唐

版式设计:李六一

陕新登字(006)号

汉书新注

施 丁 主编

三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湘子庙街12号)

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汉中地区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97.375印张 5 插页 2860千字

1994年7月第1版 1994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3,000

ISBN 7—80546—424—3/K·136

定价: 148.00元

202
施 丁 主 編

漢書新注

二

三 秦 出 版 社

施丁 主编

漢書新注

三

三秦出版社

施丁 主編

漢書新注

四

三秦出版社

责任编辑:淡懿成

周鹏飞

封面设计:毋培华

封面题签:赵步唐

版式设计:李六一

总 序

自九十年代始,我社的《中国六大史学名著丛书》陆续出版,这是一件有益于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、功及子孙后代的好事。现在,继《史记全本新注》出版之后,《汉书新注》又将与读者见面,使人鼓舞,令人兴奋。今年是《汉书》作者班固诞生一千九百六十周年[班固生于汉光武帝建武八年(公元32年)]暨逝世一千九百周年[班固于汉和帝永元四年(公元92年)死于狱中],我们出版这部《汉书新注》,也是对家乡这位伟大史学家的最好纪念。

我们中华民族有着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,我国是具有五千多年文明的泱泱古国。中国不仅以四大发明饮誉世界,其传统史学在世界民族之林中,也是独树一帜的,无论是希腊、意大利,还是巴比伦、埃及,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保存下来如此系统、如此完整的历史记录。人们都知道,中国是一个诗歌发达的国度,应该说,中国同样也是一个史书丰富的国度。

我国的历史文献,包括经史子集,浩如烟海,即以传统的正史来说,一般人也难以卒读,很有必要选出一批代表作供人们研习。唐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几在其《史通》开篇中便以《尚书》、《春秋》、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、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为史学“六家”。这个说法在当时不无道理,但到了今天,则显得不够妥当了。《尚书》早已残缺不全,今存之二十八篇不及全书的三分之一。《春秋》经失之过简,人称其“《经》(指《春秋》)而无《传》(指《左传》),使圣人闭门思之十年,不能知也”(桓谭《新论》)。《国语》言多事少,且叙述各国间史实很不

协调,清代学者崔东壁曾一针见血地指出:“《左传》之文,每月井井,事多实录,而《国语》荒唐诬妄,自相矛盾者甚多”(《洙泗考信录·余录》)。

我认为,在众多的史学典籍中,真正最具代表性的主要史书仍为六部,其中包括刘知几提到的三部:即传为春秋时左丘明(一说为孔子)所编撰的《左传》(亦称《春秋左氏传》)、西汉司马迁撰写的《史记》、东汉班固著的《汉书》。另外三部则应为刘宋范晔著的《后汉书》、晋陈寿著的《三国志》,以及宋司马光主编的《资治通鉴》。

《左传》堪称我国历史上最早的第一部编年史。《春秋》虽有三传,但《公羊传》、《穀梁传》均不能出《左传》之右,当代学者杨伯峻先生认为:“《公羊传》、《穀梁传》,不是空话,便是怪话,极少具体的有价值的历史资料”(《春秋左传注·前言》)。《史记》是我国第一部经传体通史,开二十四史之先河;《汉书》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的断代史,历来被后代修史者奉为楷模,世称“史氏自迁(司马迁)、固(班固)作传,始以品汇相从”(《史通·品藻》),其开创之功不可没。范晔的《后汉书》博采众长,自成一家之言,近代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曾说:“蔚宗(范晔字)之为《后汉书》,体大思精,信称良史。”现在,与《后汉书》同时存世的记载东汉历史的八家史书(其中包括官修的《东观汉记》)均已亡佚,而只有范书流传下来,可见优胜劣汰。陈寿的《三国志》虽然亦属断代史,但陈寿采取了将三国史事分成三书(《魏书》、《吴书》、《蜀书》)的述史方法,适应了三国史的具体需要,在断代史中别具一格;同时值得一提的是,刘宋裴松之为《三国志》所作的注,多出正文三倍,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,裴注亦为《三国志》添色增辉。《资治通鉴》是我国史书中述史时间跨度最长、体例最周详完备的一部编年体通史,影响很大,“世称绝作”(《四库全书总目·史部总序》)。记得六十年代南开大学郑天挺教授主编的《中国史学名著选》,即以上述之六部史书入选,可谓独具只眼。

上述六大史学名著自面世以来,注疏者代有其人,传世书不胜

枚举,此不赘述。建国以后,由中华书局出版的二十四史点校本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、《后汉书》、《三国志》,标点本《资治通鉴》,以及《春秋左传注》,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《春秋左传集解》等,版本精良,点校亦佳,起到了很好的效果。美中不足的是,注文多采旧注,如《史记》用刘宋裴骃(裴松之之子)的《史记集解》、唐司马贞的《史记索隐》和张守节的《史记正义》等三家注;《汉书》用唐颜师古注;《资治通鉴》用元胡三省音注等。古注系文言文,多数注者距今时代久远,加之用繁体字,不少读者感到不便接受,特别是历年来的有关研究成果,包括清代学者的考据成果及多年来的考古发现成果,无法吸收进去,因而较难出新,较难普及。

我社聘请全国各地科研机构及大专院校的著名学者,同心协力,编辑出版《中国六大史学名著丛书》,一是力求出新,努力将历年来,尤其是建国以来的有关研究成果汇集起来,供学术界研讨;二是力求普及,本丛书采用简体字横排,注释采用通俗的白话文,有的还准备全译,以供莘莘学子读书之需,以便让具有中学文化程度的人都能读懂读通。记得东汉学者王充讲过这样一个故事:“刘子政(即西汉经学家刘向)玩弄《左氏》(即《左传》),童仆妻子皆呻吟之”(《论衡·案书篇》)。封建社会的“童仆”尚能读懂《左传》,难道我们今天的广大群众反倒被关在史学大门之外吗?让六大史学名著普及到群众中去!让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之花在社会主义的今天开放得更加鲜艳夺目!

《中国六大史学名著丛书》是作者和出版者通力合作的产物,尤其是全体作者付出了大量的辛勤劳动,在丛书陆续出版之际,我再次向作者表示衷心地感谢。在丛书编辑出版的过程中,我们始终得到陕西省新闻出版局各级领导的指导和支持,可以说,没有上级的关怀和帮助,这套丛书是不可能以如此快的速度问世的。

令人高兴的是,《中国六大史学名著丛书》已经列入新闻出版署“八五”重点选题规划和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制定的新

的古籍整理重点选题规划,丛书本身得到了肯定和支持,我们有决心,高速度、高质量地完成全套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。同时,编辑出版《中国六大史学名著丛书》也是一种新的尝试,我们的经验还很缺乏,学识也很不足,一定会有不少的缺点和错误,欢迎广大读者批评指出。

抛砖引玉,我们的目的是希望能促进更多的高质量普及型史学读物的出版,让更多好书到更广泛的群众中去,以弘扬民族文化,振奋民族精神。如果这套丛书出版后,还能多少引起一些有识之士的重视的话,我们将感到十分欣慰。

周鹏飞

1992年元月于逍遥斋

凡 例

一、本书正文以中华书局校点本为底本，直接采用它的成果，故本书不再标出它校勘中使用的（ ）、〔 〕等括号及校勘记。偶有己见新意，则另行处理，或加注说明。

二、本书注释广泛地参考了古今中外名家的研究成果。主要的参考书是：颜师古《汉书注》、王念孙《读书杂志》、周寿昌《汉书注校补》、王先谦《汉书补注》、杨树达《汉书窥管》、陈直《汉书新证》、施之勉《汉书补注辩证》、吴恂《汉书注商》，以及谭其骧主编的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等。因参考的著作很多，故不一一列出。

三、本书注文力求简要、通俗。但遇有疑难问题，宁可审慎地征引诸说，而不作无根据的新解。

四、本书采用简化字排印。对于个别可能引起误会的专名（如人名、地名、书名等）仍采用繁体字。对于原文使用的古体字和异体字，一律改为现在的通用字。对于原文中使用较多的通假字，一般是在其后加括号（ ），写出现在的常用字，而不烦琐地加注说明。

五、本书根据结构与篇幅，精装本分四册出版，第一册是纪、表，第二册是志，第三、四册是传。

六、本书之末附录几种文献资料，还列了几个有关时、地、人、事、字的表，以供读者参考。

前 言

《汉书》是继《史记》而问世的一部史学名著。它开创了纪传体断代史的先例，记事详赡得体，大一统和正统思想浓重，在中国史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。

(一)

《汉书》主要的作者班固(公元32—公元92)，字孟坚，扶风安陵(今陕西咸阳市东北)人。他出身于汉代显贵和儒学之家，受家学影响很大。

班固的祖先于秦汉之际在北方从事畜牧业致富。后来世代从政，并受儒学熏陶。曾祖父况，举孝廉为郎，成帝时为越骑校尉，况女被成帝选入宫中为婕妤。大伯祖父伯，受儒学，以“沈湎于酒”谏成帝，官至水衡都尉。二伯祖父游，博学，官至右曹中郎将，曾与刘向校理秘书。祖父稚，官至广平相，被王莽排挤而为延陵园郎。

其父班彪(公元3—公元54)，幼年从兄班嗣一同游学，结交很广。二十多岁时，农民起义失败，群雄割据，隗嚣拥众割据于天水，因避难而从之。隗嚣问以世务，班彪对答：周秦以来，统一代替分裂，势之必然。并说：“汉家承秦之制，并立郡县，主有专己之威，臣无百年之柄。至于成帝，假借外家，哀、平短祚，国嗣三绝，危自上起，伤不及下。故王氏之贵，倾擅朝廷，能窃位号，而不根于民。是以即真之后，天下莫不引领而叹。十余年间，外内骚扰，远近俱发，假号云合，咸称刘氏，不谋而同辞。方今雄杰，带州域者，皆无七国

世业之资。今民皆讴吟思汉，向仰刘氏，已可知矣。”意思是说，刘氏政权，深入人心，外戚窃权，众所反对，百姓思念刘氏复汉。这个说法，虽然含有正统思想，但还是反映了当时实际情况的。隗嚣不同意这个看法，认为群雄逐鹿，强者称雄，不信“汉家复兴”之说。为了充分表达己见，班彪乃著《王命论》，他认为：汉德承尧，有灵命之符，深入人心，不可动摇，“神器有命，不可以智力求也。”故百姓起事失败，王莽窃权诛灭。“穷达有命，吉凶由人”，陈婴之母知项氏必亡，王陵之母知刘氏必兴，可谓懂得祸福之机。同时还论说刘邦兴汉，有“帝尧之苗裔”，“体貌多奇异”，“神武有徵应”，“宽明而仁恕”，“知人善任使”等五大特点，天命加以人事，才能造成帝业。所以识世务者，应当“拒逐鹿之瞽说，审神器之有授”，不可妄图富贵而贻笑天下。

因隗嚣固执己见，顽固地割据称雄，班彪只能离去，投奔河西窦融，颇受窦融器重，任为从事。他为窦融划策，归顺刘秀政权，总西河以拒隗嚣。这对东汉统一是有功的。光武帝（刘秀）闻知其才，召见了，他，举茂材，任为县的长官，又为司徒掾。班彪时有奏言，对时政多所建议，如《复护羌校尉疏》、《上言选置东宫及诸王国官属》、《奏议答北匈奴》等。

班彪专心于史学，尤好汉代史。汉武帝时，司马迁撰写了一部史书（后来称《史记》），从传说中的黄帝写到当代汉武帝，后事缺而无录。后来褚先生、刘向、刘歆、冯商、扬雄等十多位学者都曾缀集时事，或补或续之。班彪认为续作“多鄙俗”，不足以踵继司马迁之书。于是继续采集西汉遗事，又旁贯异闻，作《后传》数十篇。此书是续《史记》之作，但“不为世家，唯纪、传而已”。

《后传》原书已佚，其内容想已多为《汉书》汲取，只是无法辨认清楚了。今《汉书》的元帝、成帝二纪及韦贤、翟方进、元后三传的《赞》，还保留有班彪的史论文字。《元帝纪赞》“臣外祖兄弟为元帝侍中”，《成帝纪赞》“臣之姑充后宫为婕妤”，其中的“臣”，为班彪自

称,“外祖”是金敞,“婕妤”即况女班婕妤。《元帝纪赞》称元帝“多材艺”,“少而好儒”,即位后任用儒生,“贡(禹)、薛(广德)、韦(贤)、匡(衡)迭为宰相”,而元帝“牵制文义,优游不断,孝宣之业衰焉”。这是讥元帝儒而不才,掌权无能,从此汉朝走了下坡路。《成帝纪赞》先称成帝“善修容仪”,“可谓穆穆天子之容者”,似乎是予以表扬;但笔锋陡然转变,“然湛(耽)于酒色,赵氏乱内,外家擅朝,言之可为於邑。建始以来,王氏始执国命,哀、平短祚,莽遂篡位,盖其威福所由来者渐矣。”这是指责成帝荒淫,大权旁落于外戚,终于有王莽篡权的悲剧。此论与其答隗嚣问以及《王命论》的含意是一致的。《翟方进传赞》肯定翟义起义反对王莽是“怀忠愤发”;但又哀叹他“义不量力”而失败,弦外之音是只有刘秀得天人之助,才能诛灭王莽。《元后传赞》总结历来“女宠”的危害,同时指出王莽依恃元后(王政君,王莽之姑)而逐渐窃取大权。所谓“位号已移于天下,而元后卷卷犹握一玺,不欲以授莽,妇人之仁,悲夫!”实乃讽刺元后是一个被王莽欺诳玩弄的非常可怜的愚弱老妇。

《元后传》记述,平帝死后,孺子婴尚未立之时,汉朝传国玺藏于长乐宫元后之处。“及莽即位,请玺,太后不肯授莽。莽使安阳侯舜谕指。舜素谨敕,太后雅爱信之。舜既见,太后知其为莽求玺,怒骂之曰:‘而属父子宗族蒙汉家力,富贵累世,既无以投,受人孤寄,乘便利时,夺取其国,不复顾恩义。人如此者,狗猪不食其余,天下岂有而兄弟邪!且若自以金柜符命为新皇帝,变更正朔服制,亦当自更作玺,传之万世,何用此亡国不祥玺为,而欲求之?我汉家老寡妇,旦暮且死,欲与此玺俱葬,终不可得!’太后因涕泣而言,旁侧长御以下皆垂涕。舜亦悲不能自止,良久乃仰谓太后:‘臣等已无可言者。莽必欲得传国玺,太后宁能终不与邪!’太后闻舜语切,恐莽欲胁之,乃出汉传国玺,投之地以授舜,曰:‘我老已死,如而兄弟,今族灭也!’舜既得传国玺,奏之,莽大说,乃为太后置酒未央宫渐台,大纵众乐。”此段写元后握玺授玺的言行情态,生动传神。如果可以

说《元后传》是班彪所作；那么，也就可以肯定班彪的史传文字是很出色的。

班彪曾作《前史略论》，详论以往的史学得失，实为撰写《后传》有所借鉴和改进。他简要地追述了先秦秦汉之际的史官和史籍，着重评论司马迁所著《史记》的内容、体裁、体例和思想。他说：“迁之所记，从汉元至武以绝，则其功也。”“然其善序事理，辩而不华，质而不野，文质相称，盖良史之才也。”充分肯定了司马迁的史才。但又评道：“其论述学，则崇黄老而薄《五经》；序货殖，则轻仁义而羞贫贱；道游侠，则贱守节而贵俗功；此其大敝伤道，所以遇极刑之咎也。……诚令迁依《五经》之法言，同圣人之是非，意亦庶几矣。”这对司马迁的异端思想极尽讽刺，表明了他的正宗观点，自然也是他写《后传》的指导思想。《前史略论》是中国古代较早的一篇史学论文，可谓儒家正统史学观点的代表，在中国史学理论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。

班彪的历史思想和史学思想，对班固和《汉书》有直接而深刻的影响。检阅班固《汉书》述论西汉盛衰兴亡及撰写儒林、游侠、货殖等传的旨趣，就可了然。

(二)

班固一生的主要精力和成就，都表现于著述《汉书》。

班固自幼在其父班彪教育下，受儒学熏陶，九岁能写文章、诵诗赋。十六岁至二十三岁在洛阳太学读书，博览儒学经籍及诸子百家之言，并广泛探究。治学不拘于章句，着重领略大义。这为著述《汉书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。

建武三十年(公元54)，班彪病死，留下了遗作《后传》。班固离开太学，返乡为父守丧，并阅读其父《后传》的手稿。从此以后，他感到其父“所续前史未详”，于是反复思考，欲继承和发展前人的史学事业，自永平(公元58—75)初年起，着手编撰《汉书》，专写西汉一

代二百三十年的历史。这是适应大一统的时代需要而编撰的。自司马迁撰《史记》之后,统一的西汉皇朝由盛而衰,经绿林、赤眉起义和王莽篡权,西汉灭亡,东汉又随之兴起。在复杂的阶级斗争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中,封建统治阶级,一方面总结历史经验,在政治上作出对策;另一方面又借助思想文化,加强思想统治。史学为适应历史需要,只是补续《史记》,接连着写明史事,这是远远不够的,就是班彪的《王命论》和《后传》也只是适应一时之需,临时性的应付,未能完全承担起时代需求的使命。班固写西汉全史,给统一的西汉皇朝以突出的历史地位;总结它的兴亡盛衰及政治上的成败得失,才完全适应了历史的需要。

就在班固着手编撰《汉书》不久,永平五年(公元62),有人向朝廷上书,告发班固“私改作国史”,皇帝下诏收捕,班固被关进了京兆监狱,家中的书籍也被查抄。其弟班超担心他受屈而难以自明,便赶往京都上书,在汉明帝面前申说班固著述之意,地方官也将其书稿送到朝廷。汉明帝了解情况后,很欣赏班固的才学,召他到校书部,任命他为兰台令史。兰台是汉朝收藏图书的地方,专设官员管理和校定图书。兰台的令史共有六名,秩百石,掌管和校定图书是其职责。这个工作,对读书和治学极为有利,对著书立说提供了宝贵的物质条件;对于班固著述《汉书》当然也是有利的。

班固做了兰台令史,便和陈宗、尹敏、孟冀等人共同撰成《世祖本纪》,这是写汉光武创立帝业的历史。班固因此升迁为郎,“典校秘书”。他又撰写开创东汉的功臣列传以及平林、新市、公孙述载记共二十八篇,送呈朝廷。这些著述,都被后来官修的《东观汉记》所采用。完成上述著作后,他又在汉明帝指使下继续撰写《汉书》。他在散文赋《答宾戏》中表示决心,“专笃志于儒学,以著述为业”。先后历时“二十余年”,到“建初(公元76—公元83)中,完成了大部分的著述任务,受到社会重视,“当世甚重其书,学者莫不讽诵焉”。

班固自为郎之后,与皇帝接触的机会多了,“遂见亲近”。当时